

白釉绿彩器的产生、发展与流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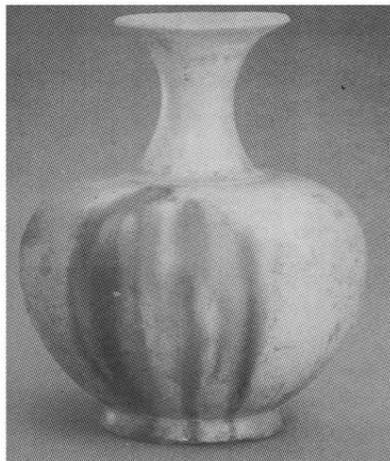
易立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以现有的考古发现看，白釉绿彩器的材料主要集中在北齐、唐、五代北宋（辽）三个时间段，本文考察了这一陶瓷品种在各个时期里的大致面貌，并简要探讨了其产生、发展及流向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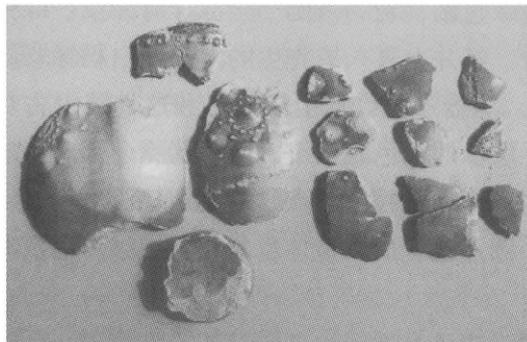
关键词：白釉绿彩器；产生；发展；流向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2-0086-06

在中国古代为数众多的彩釉陶瓷中，有一类被称作“白釉绿彩”的作品，其制作的方法虽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是在胎面先施罩一层白色化妆土作底，然后再于透明釉釉面或釉下加涂含铜量较高的绿彩料，最终入窑于氧化气氛中一次烧成。根据釉面所表现的效果，这类器物大体可分为两种，其一是白、绿二色釉斑驳不均，晕散呈流淌交融状；其二则通体白釉上仅局部范围内加施绿彩作为装饰纹样。数十年间，经各地考古发掘成果表明，所谓“白釉绿彩器”并非某一时段里所特有的品种，而具有较长的生产和使用历史，且烧造范围分布亦广，甚至一度成为外销陶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年冯先铭先生即曾对白釉绿彩瓷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发展状况作了简明扼要的考察^[1]，给予了笔者不少的启发。本文拟综合现已公布的相关出土物，试图就这类陶瓷器的发展脉络及各时期的大体面貌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图一



图二

截止到目前，明确的白釉绿彩器最早见于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2]，所出者分别为两件球腹三系罐和一件长颈瓶（图一），胎质均洁白细腻，里表施乳白色透明釉，釉面还留有类似凝脂的滴痕，绿釉彩都表现作条带状，涂绘于肩腹部位置。此外，日本九州壹岐市双六古坟亦出土有若干数量的白釉绿彩残片（图二）^[3]，经

复原可辨属一件直口深腹碗，其胎土呈灰黄白色，质地较软，内侧通体挂绿釉。除了器表加涂绿彩作装饰，碗的外腹部四面另采用贴、印等技法环绕有大小不一的几圈联珠花纹。依据胎釉及

造型的特征，弓场纪知推测它应属六世纪中后期华北窑场的产品，并指出器表上饰联珠图案基本是模仿同时代染织物的手法^[4]。另一方面，与前述作品风格相近、流行于同时期墓葬遗迹的还包括多件黄釉绿彩陶，二者作为北齐二彩铅釉的代表以往也曾被视作唐三彩的前身^[5]。暂不论这一说法是否成立，仅就黄釉绿彩陶的出土情况看，其数量明显偏多^[6]，而单色黄釉正是北齐与稍早时的东魏墓葬中最常见的铅釉陶品种^[7]，所分布的范围集中在当时政治中心邺城、晋阳及周边区域。如再考虑到该阶段里对白釉呈色的掌握还并不十分成熟，则目前所见只占少数的白釉绿彩器最初可能也是出于生产黄釉绿彩陶的目的入窑烧造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提及的三系罐、长颈瓶和直口深腹碗均系六世纪前后的北朝陶瓷业之新兴器式，后者一般被认为是受到西方玻璃和金属器影响下产生的^[8]。将白釉绿彩应用到这些新事物上随葬入墓中究竟代表有何种特殊的意味，目前已不得而知，然而从这批墓葬材料可观察到，以白、黄釉绿彩为主体的北齐二彩铅釉陶已体现出较成熟的技术面貌，可能并非短时间内问世的新品。就此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出土的釉陶器^[9]尤需引起重视，这批遗物主要出于属北魏时期文化堆积的窖穴、水井和半地穴房舍等遗迹内，故年代上似较清楚，当中虽不乏一般的单色釉器物，但也包括有个别于黄釉底上添加草绿色的二彩釉陶，以及先在陶胎上用白色粉彩描绘纹样，再通体荡酱色釉烧成的所谓“釉下彩釉陶”（图三）。据报告所述，大市遗址内所见的二彩釉陶胎质、釉色、做工方面都较单色作品精细，其究竟属生活用具或是墓葬明器，由于详情不明还不好断言^[10]，但可以肯定与北齐同类作品间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或可作为今后探讨此一问题的重要线索。

以华北地区的北朝窑址材料看，现经确认已有河北邢窑^[11]、山东淄博寨里窑^[12]、枣庄中陈郝北窑^[13]、临沂朱陈窑^[14]、江苏徐州户部山窑^[15]及河南巩义白河窑^[16]等几处，另外河北磁县南营村还发现有十六国时期的陶窑遗迹^[17]，然当中均未见白釉绿彩等二彩铅釉器的踪迹。又根据杨銜之对北魏洛阳城的描述，城北郭内的闻



图三

义里便居住了不少“造瓦者”^[18]，而清代文献中甚至提及到元魏时供作御物的“洛京陶”^[19]，可知北朝时期的洛阳城内或也存在窑业作坊，不过仍需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予以证实。尽管如此，出土物的具体分布点却更加直接地暗示我们，其产地无疑应位于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附近的黄河下游一带。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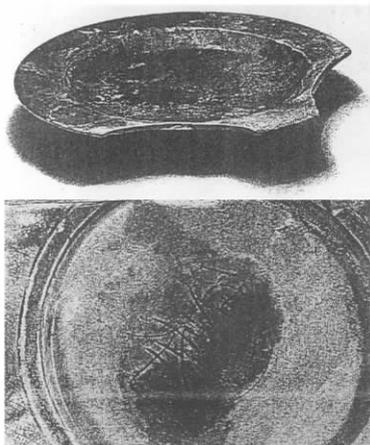
北齐以后，稍晚阶段的白釉绿彩器可举日本奈良县龙田御坊山古坟出土物为例^[20]。该墓等级较高，墓主可能属飞鸟时代（公元538—709年）的贵族阶层，墓中随葬除玻璃、琥珀制品外，另有一件施釉的带盖圆砚（图四）。对于陶砚的产地，曾一度有观点认作是由朝鲜半岛输入的，但目前似以中国说更为有力^[21]。从刊布的图片看，其盖顶面微鼓，正中凸起一伞状钮，砚面平坦，器底附带多个呈水滴形的蹄足。形制相近的青瓷砚也见于湖南湘阴隋大业六年（610年）墓^[22]、长沙唐代早期墓（咸嘉湖M1）^[23]、四川邛崃固驿瓦窑山窑址隋至初唐地层（如II式



图四

砚, 88QGT4 : 1556)^[24]及成都青羊宫窑(II、III式砚)^[25]中见到, 均系七世纪初前后所流行。

到了晚唐之际, 白釉绿彩陶瓷的生产逐渐步入高峰期, 考古发现的资料明显增多, 如倾覆时间推定为九世纪30年代前后(不会早于826年)的印尼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海域“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上即出水这类作品数量近二百件, 且器类亦颇为丰富, 包括玉壁足碗、盘、钵、注壶、盖罐、盒、三足盂等涵盖当时墓葬等遗迹常见的生活用具组合, 其中于一件圆口折沿盘的圈足底更铭刻有“进奉”字样(图五), 透露出其最初生产的性质可能与官府或宫廷内库机构有关。此外, 沉船白釉绿彩器中还伴出了长颈带把壶(图六)、穿带瓶这类蕴含异域风格的特殊器形, 与前者形制接近的低温铅绿釉制品以往在河北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中晚唐墓葬里发现尤多, 究其源头则显然可上溯至萨珊或粟特系统的



图五

“胡瓶”^[26]; 而如后者一样两侧附加穿带的瓶则在晚唐五代的邢窑^[27]、越窑^[28]、耀州窑^[29]和长沙窑^[30]等窑场都有过烧造, 当中不少肩腹部还刻画成直立的双鱼图案, 曾有学者认为此或系白居易诗中提及作盛酒之用的“双鱼榼”形象^[31]。另一方面, 作为九至十世纪陶瓷贸易商圈重要据点的日本、东南亚、波斯湾沿岸多个遗址均出土有不少的白釉绿彩器, 所见造型类别大体不超过“黑石号”的范围, 且同样是和越窑青瓷、邢窑系白瓷及长沙窑彩绘瓷共存, 显示了晚唐时中国外销陶瓷的基本组合。值得一提的是, 国内的白釉绿彩器流布入伊斯兰地区后, 还一度促使当地出现于锡釉白陶器上装饰铜绿烧制的所谓“彩斑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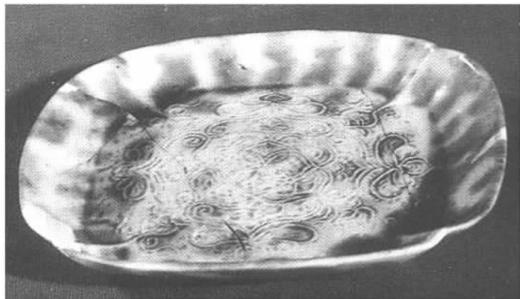
(Splash ware), 成为由唐代陶瓷器推动下伊斯兰制陶业的三大成就之一^[32]。

相比于外销的白釉绿彩器, 国内晚唐墓葬、城址等遗迹所见数量则明显偏少, 其中又以江苏扬州一带出土最集中^[33]。众所周知, 因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南北物资重要汇聚地的扬州, 既是当时经济中心, 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输入到该地区的白釉绿彩器, 除部分是见于窖井及住所等单位、或系本土居民日用品遗物外, 有的还出土于推测性质属商业店铺之类的建筑基址内, 且这些器物的样式和装饰与前述“黑石号”沉船作品十分接近, 故不排除有用作外销的可能。扬州以外, 另如河南安阳薛家庄唐墓^[34]、三门峡刚玉砂厂工地及化工厂、粮食局面粉厂唐墓^[35]、隋唐洛阳城宫城南墙^[36]、洛阳城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址^[37]及安徽淮北柳孜运河遗址^[38]等多个地点都可见到零星的白釉绿彩作品, 器形上以喇叭颈短流注壶常见, 洛阳宫城出土物腹部还呈现瓜棱状突起; 白居易故居址为一件委角方形浅盘, 内底模印团花纹样(图七)。

上述器物釉面的绿色彩斑多晕散流淌, 覆盖了大部分的器表, 而个别作品上的白釉痕迹几乎已不甚明显。谢明良^[39]和秦大树^[40]二人都曾注意到晚唐时期的一些绿釉陶实际原本也是白釉绿彩的个体, 只不过因烧造时添加的绿釉成分过多, 以至遮住了底釉的颜色。此外, 虽然目前还缺乏直接的证据表明晚唐与北齐白釉绿彩之间的传承关系, 但曾有观点指出原在豫北安阳等地颇为发达的单色及二彩铅釉陶烧制技术很可能随后流入邻近的巩义窑, 并得到长足的进步, 成为产生盛唐三彩的重要契机^[41]。有意思的是, 晚唐作品表面这种白、绿釉



图六



图七

斑驳交融的形态也时常出现于部分盛唐三彩器上，二者的施釉方式应存在某些相同之处。因此，若从这些迹象看来，北齐二彩、盛唐三彩与晚唐白釉绿彩间又隐约显示出嬗变演进的序列。另一方面，针对晚唐白釉绿彩的产地问题，目前学术界也存在分歧，但多数看法倾向于北方一带窑场，有学者即推测“黑石号”沉船所出者或许产自以邢窑为代表的河北南部窑口^[42]，然而鉴于当前该地区的窑址佐证材料尚显薄弱，故仍有待明确。与之相对应，河南中、北部的巩义^[43]、登封^[44]、辉县^[45]、鹤壁集^[46]等窑址晚唐时期均生产白釉绿彩，如巩义黄冶窑第四期遗物便包括圈足碗、盘及短直流注壶等多种（图八）^[47]，且同文化层（IIIT35）还伴出了一定数量的绿釉陶器，所见以一件带吸管的高足式杯最独特，与之造型完全一致的作品则同样见于“黑石号”沉船，曾被考定为类似文献中“鼻饮杯”的用具^[48]。事实上，该阶段里烧造白釉绿彩的区域已相当广阔，西起陕西铜川黄堡^[49]、南至湖南长沙^[50]及四川邛崃^[51]等地多处窑址的出土物中也常见这



图八

一品种，其中后者白釉多泛青灰色，绿彩呈小斑点或团块状饰于注壶、罐、盂、粉盒等器物之上（图九）。

三

五代北宋时，白釉绿彩继续流行。湖南长沙市郊十国墓葬曾集中出土了多例^[52]，丝茅冲营地B区M15（55长·丝·营BM15）一件白釉盒盖，盖身隆起作多曲花瓣式，外表模印菱形花卉图案并加施绿色彩斑，与之共存的遗物还包括楚



图九

王马殷铸造的“乾封泉宝”铁钱。至于同地点另几件作品，装饰上则大体接近，且都属盒一类器形。河南新密法海寺塔基所出七层陶舍利塔^[53]，第二层塔身前壁的匾牌上刻有“咸平二年（999年）四月二十八日记施主仇训”题记，其主体挂绿、白二色釉，局部以黄、褐彩点缀（图十）。窑址方面，河北磁县观台磁州窑遗址第一期前、后两段（约北宋早、中期）遗物内均出现有一定数量的白釉绿彩器，并延续至第二期前段（北宋后期），器形种类涵盖香炉、瓶、罐等^[54]。它们施釉的工艺流程虽与前代作品基本一致，但绝大多数器表的绿彩仅在局部小面积使用（图十一），简洁却失于单调，釉面呈现的效果已较晚唐时迥然有异。



图十



图十一

汉地以外，辽境内的白釉绿彩陶瓷亦有不少发现，如年代约在十世纪后半叶的辽宁阜新白玉都墓出土的一件盘口穿带瓶^[55]，主体釉色白中闪黄，肩部位置装饰三块桃形的绿彩。到辽中晚期，这种彩釉技法应用更为普遍，主要是白釉提梁式鸡冠壶腹部附加的绿彩仿皮条纹路，其次是盆，内底划花并涂绘绿彩或绿斑^[56]。另据考古调查，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一带多处窑址就烧造过类似制品^[57]，如宝山村小南沟窑址采集到鸡冠壶等残片，代白乌苏村南窑址、水泉沟窑址则均出土有白釉和绿釉两种单色釉陶器^[58]，它们在辽代的产生与发展或曾受到临近的华北及中原窑场的影响。

总体而言，白釉绿彩器的烧造在这一阶段里基本已趋于平淡，不仅国内的墓葬、城址等遗迹中所见数量明显减少，就连外销陶瓷中也罕见它的身影，如推测年代都属于十世纪的“印坦”（Intan）^[59]和“井里汶”（Cirebon）沉船^[60]遗物中均未见相关作品，或许透露出此时的白釉绿彩器大概已退出对外贸易的历史舞台^[61]，而回归到仅满足于内部市场的有限需求之中。

注释：

[1] 冯先铭：《白釉绿彩瓷器》，载同氏：《古陶瓷鉴赏》260-265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2]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期。另外，近年发掘的同地固岸东魏北齐墓群中亦出土有白釉绿彩双系罐，然具体情况尚未公布，参见潘伟斌、薛冰：《河南安阳固岸墓地》，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102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3][4]（日）弓场纪知著、王虎应译：《长崎县壹岐双六古坟出土白釉绿彩圆纹碗》，载山西省北朝文化研究中心编（张庆捷等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310-32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5]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6] 可举墓例如山西太原娄睿墓（北齐武平元年，570年）、

河南濮阳李云墓（北齐武平七年，576年）等。

[7] 可举墓例如河北景县高雅墓（东魏天平四年，537年）、山东高唐房悦墓（东魏兴和三年，541年）、山西寿阳库狄迴洛墓（北齐河清元年，562年）、山西太原徐显秀墓（北齐武平二年，571年）、河南安阳范粹墓（北齐武平六年，575年）等。

[8][41]（日）森达也，《论南北朝华北陶瓷的革新》，载山西省北朝文化研究中心编（张庆捷等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329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12期。

[10]（北魏）杨衒之撰、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第四《城西》“法云寺”条：“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輶车为事。”，中华书局，2006年。据此推测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出土的陶瓷遗物中也不排除包含了当时的丧葬明器。

[11] a.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9期；

b.王会民、张志忠：《邢窑调查试掘主要收获》，《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7年年会论文集）；

c.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内丘县文物保管所等：《邢窑遗址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4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12] 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等：《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13]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枣庄中陈郝瓷窑址》，《考古学报》1989年3期。

[14] 宋百川、刘凤君：《山东地区北朝晚期和隋唐时期瓷窑遗址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86年12期。

[15]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户部山青瓷窑址调查简报》，《华夏考古》2003年3期。

[16] 赵志文、刘兰华：《河南巩义白河窑址发现北魏青瓷、白瓷和唐青花瓷器》，《中国文物报》2008年2月6日2版。

[17] 朱岩石、何利群：《河北磁县北朝墓群发掘M63与十六国窑址》，《中国文物报》2007年7月27日2版。

[18] 注[10]引书，卷第五《城北》“凝圆寺”条：“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高祖名闻义里。……唯有造瓦者止其内，京师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城东北上商里，殷之顽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瓦子，人皆弃去住者耻。’”

[19]（清）蓝浦撰、郑廷桂补：《景德镇陶录》卷第七“洛京陶”条：“亦元魏烧造，即今河南洛阳县也，初都云中后迁都此，故亦曰洛京，所陶皆御物。”，据同治九年刻本影印，收《中国陶瓷名著汇编》，中国书店1991年。

[20] a.（日）弓场纪知著、王虎应译：《长崎县壹岐双六古坟出土白釉绿彩圆纹碗》，载山西省北朝文化研究中心编（张庆捷等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310-32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b.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年3期。

[21] 谢明良：《日本出土唐宋时代陶瓷及其有关问题》，（台北）《故宫学术季刊》13卷4期（1996）。

[22] 熊传新：《湖南湘阴隋大业六年墓》，《文物》1981年4期。

[23]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6期。

[24] a.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省邛崃县固驿瓦窑山古瓷窑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1990年；

b.陈显双、尚崇伟：《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载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25] 四川省文管会、成都市文管处：《成都青羊宫窑址发掘简报》，载《四川古陶瓷研究》编辑组编：《四川古陶瓷研究》（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

[39][42][48] 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

[26] 易立：《唐代凤首壶杂识》，《文物春秋》2006年5期。

[2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内丘县文物保管所等：《邢窑遗址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4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28] 越窑此类制品参见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两座唐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3期。

[29] 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2年；

b.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0][50] 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31] 谢明良：《从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三彩鱼形壶谈起》，（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0卷10期（1993）。

[32] 汪庆正：《中国唐代陶瓷器对伊斯兰地区9-10世纪制陶业影响的若干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第9期（2002）。

[33] a.南京博物院发掘工作组等：《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文物》1977年9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扬州考古队等：《江苏扬州市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5期。

[34]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薛家庄殷代遗址、墓葬和唐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8期。

[35]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2》（河南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

[36] 洛阳博物馆：《洛阳发现隋唐城夹城城墙》，《考古》1983年11期。

[3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淮北市博物馆：《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38]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8期；

b.（日）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遣唐使が

見た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新の精华》，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特别展图录，第45册，1995年。

[40] 秦大树：《巧制明月染春水——记一件绿釉定窑梅瓶兼谈北方绿彩瓷》（下篇），《收藏界》2006年3期。

[43][4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巩义市黄冶窑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4期。

[44] 冯先铭：《河南密县·登封唐宋古窑址调查》，《文物》1964年3期。

[4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辉县古窑址调查简报》，《文物》1965年11期。

[46]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鹤壁集瓷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8期。

[4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2年。

[51] 陈显双、尚崇伟：《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载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5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周世荣编著）：《湖南古墓与古窑址》，岳麓书社2004年。

[53] a.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他文物》，《文物》1972年10期；

b.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2》（河南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

[54] a.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磁县观台磁州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4期；

b.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55]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化馆：《辽宁阜新县白玉都辽墓》，《考古》1985年10期。

[56][57] 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58] 彭善国、周兴启：《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代窑址的调查》，《边疆考古研究》第八辑（待刊）。

[59] a.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思鉴（Janice Stargardt）：《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0卷（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b.秦大树：《拾遗南海补阙中土——谈并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6期。

[60] 秦大树：《拾遗南海补阙中土——谈并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6期。

[61] 五代北宋时期的外销陶瓷中极少见到白釉绿彩器也可能和贸易港口的兴衰、变迁有关，即与北方窑场间交通连接相对便利的扬州港此时已渐趋衰落，商船们大多选择由明州、泉州或广州等地解缆出航。